

# 论《神圣家族》中的萌芽唯物史观及其历史意义

马竞越

(首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48)

**摘 要:**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神圣家族》,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经历了从孕育到诞生、从萌芽到形成的发展过程。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发展的过程中,《神圣家族》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鲍威尔唯心主义哲学,再次对黑格尔思辨哲学进行了彻底批判,并将批判德国哲学唯心主义与阐明唯物史观的重要原理相结合,形成了对唯物史观一些重要观点的初步表述,为唯物史观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神圣家族》;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B51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9891(2021)2-0030-07

## 0 引言

唯物史观之所以被看作是马克思的两大重大发现之一,就在于它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基础上科学地揭示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唯物史观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在思想交锋中孕育和诞生、在自我批判中萌芽和在理论扬弃中发展的逐步提升过程。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扬弃贯穿于马克思唯物史观发展的始终。恩格斯在谈到《神圣家族》时说:“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sup>[1]241</sup>在列宁看来,《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中的重要哲学著作。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发展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理论成果,开始从多个角度针对以鲍威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思辨哲学进行了深刻批判,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最终完成唯物史观的构建。

## 1 揭示“思辨结构的秘密”

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和以往历史观不同的全新的社会历史观,其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对前人思想的批判继承。在《神圣家族》之前,马克思已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开始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进行批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将自我意识与人等同起来的观点,马克思认为“人是自我的”<sup>[2]164</sup>,自我意识是人的自我意识,是第二性的。在对主客体关系的认识上他指出,在黑格尔那里“主词和宾词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这就是神秘的主体—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己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使外化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sup>[2]176</sup>。马克思根据现实的物质生活,指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缺陷,即作为主体的是绝对观念,而现实的人和事物变成了绝对观念的外化,绝对观念所进行的运动便是抽象的、在思维上的运动。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想基础之上,批判了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并意在借此对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进行彻底的揭露与批驳。在马克思看来,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是不彻底的,鲍威尔一伙的自我意识哲学是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片面发展。因此,揭示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秘密”就成了唯物史观产生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理论准备。

在《神圣家族》第五章中,马克思以苹果、扁桃、梨和“果品”为例,揭示出在黑格尔思辨哲学中思想和现

收稿日期:2020-11-08

基金项目: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2020MZD014)

作者简介:马竞越(1997—),女,河北保定人,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实发生了“头足倒置”。一方面,黑格尔思辨哲学将“果品”这个抽象观念臆想成现实的果实的“本质”,而苹果、扁桃、梨等反倒成为“果品”的存在形式;另一方面,黑格尔思辨哲学将千差万别的特殊的果实“概括”为“果品”这个统一体的不同生命表现,并从属于“果品”。对此,马克思说:“这种办法,用思辨的话来说,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sup>[3]279</sup>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论述了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的错误之处在于用“自我意识”代替“人”,并将自我意识看作是人的唯一存在方式,这样人的所有的历史活动都变成思想观念的历史。而实际上,现实的人是思维和存在相统一的,历史应是现实的人完成的物质生产的历史。始于对物质利益问题的思考,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决定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不是“绝对精神”,而是人民群众的劳动和实践——“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sup>[3]320</sup>。

总体而言,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与批判,认识到“绝对精神”和“自我意识”是认识论上的颠倒,应从现实的、实践的人出发考察社会历史发展,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初步形成提供了出发点和生长点。

## 2 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英雄史观

马克思的群众观是唯物史观中的重要内容,关于人民群众地位和作用的论述贯穿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并在其早期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群众观表现为通过对国民经济的批判揭露人民贫苦的根源,把握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的群众观表现为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将“绝对精神”与群众相对立的英雄史观,分析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使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基于对社会历史充分考察所得出的科学认识,马克思揭示了人民群众的社会历史主体角色和作为主体创造历史的条件性,形成了科学的群众观。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群众思想的研究由政治制度层面转向了哲学层面,对异化劳动、私有制、共产主义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开始探究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的途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是不自由的,资本家的剥削使人的精神和肉体受到摧残,异化劳动使人的本质无法得到实现。马克思通过对私有财产的表现形式——工资、资本和地租的研究,分析出造成人民贫困与被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因此要实现人的解放唯有废除私有制,消灭异化劳动。此时,马克思的群众观已经初步包含了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思想。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区分“绝对精神”与群众之间的差别,对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英雄史观和黑格尔的历史观进行揭露与批判,将其群众观升华到一个新的质的阶段。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论证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创造作用,而不是简单地从人的本质异化和复归的观点出发认识历史与群众的关系,这是《神圣家族》不同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要进步之处。在历史领域,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就表现成了英雄史观。在黑格尔哲学中,历史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人民群众是绝对精神的承担者并为历史的绝对精神提供它所需要的材料,哲学家是区别于人民群众并在事后负责回顾被绝对精神完成了的历史运动的人。黑格尔认为:“从需要的观点看来,观念的具体对象就是我们称之为人的那种东西。”<sup>[14]205</sup> 据此可以看出,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将具体的历史的人抽象化了,即当思辨在其他一切场合谈到人时,他们所说的人都是“观念”“精神”。片面解读和发展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鲍威尔则认为,“批判”即是绝对精神,并通过少数杰出人物即青年黑格尔派体现出来,因而“群众”也便仅仅作为“精神”的对立面,作为保守主义、教条主义的化身,作为被“批判”的需要而存在的了。鲍威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将现实世界的一切感性的斗争变为纯粹的观念的斗争,在马克思看来这实质上是对黑格尔的历史观漫画式的完成。而事实上,现代历史并非是由观念上的斗争推动的,思想本身并不能实现什么东西,只有当思想与人民群众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时,才能通过现实的实践活动得到实现。在群众与精神的关系上,群众的利益决定精神,而绝非自我意识或决定精神决定现实的人,思想的产生必然体现人民的利益,思想的实现必然借助人民的力量。

在揭示了黑格尔和鲍威尔的英雄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进一步正面论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第六章中,马克思从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这一前提出发,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指出



鲍威尔的群众概念由于缺乏对历史发展的深入考察,其实质是一个静止的概念,现实的群众是随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生改变的,并进一步论述了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sup>[13]287</sup>。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群众”是“反动”且“保守”的,而是它没有充分激发起群众的热情和力量,据此,马克思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sup>[5]149</sup> 在这一结论中蕴含着马克思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原理的萌芽:首先,人民群众本身不是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历史发展而发展变化的;其次,物质利益的实现离不开动员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将随着社会进步而越来越大;再次,无产阶级是群众中最具先进性的阶级,是“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的创造历史的主体。

由以上论述可看出,较之《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群众观的论述,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更加聚焦于批判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英雄史观,并力图将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思辨的辩证法在群众观的视角上转变为以现实的个人为起点的历史的辩证法。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的深入探索和反复强调,为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群众史观理论奠定了初步基础。

### 3 物质生产是理解历史发展的基础

物质生产劳动是人和人类社会的历史起点,因此物质生产的基本原理是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研究已经接触到了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吸收了费尔巴哈关于“人是类存在物”的观点,提出人之所以是类存在物,根本上是在于人从事生产劳动。通过对异化劳动的研究,马克思认识到人的劳动会生产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关系,即劳动者与劳动产品之间相异化导致人与人相异化,这一发现为马克思深入探讨生产活动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提供了思想基础。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初步形成了劳动是历史的发源地这一思想萌芽,但他将人的本质作为评定经济关系合理性的依据,没有认识到人和人的本质对生产关系的依赖性,还不理解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而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在《神圣家族》中,通过对经济社会的深入研究,马克思开始从现实世界出发接触到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历史发源地问题为出发点对物质生产的重要地位进行了一系列阐述。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批驳了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关于历史发源地问题的唯心主义回答,对物质生产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以及在生产活动中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进行了具有唯物史观色彩的初步表达。在解释社会历史发展时,思辨哲学将历史的发源地和唯一的创造因素定义为“绝对精神”或“自我意识”,自我意识要成为世界的创造者就必定要使自己外化于世界,于是世界就变成了自我意识的生命表现。黑格尔认识到劳动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部分作用,但他只是把劳动看作是绝对精神发展的一个环节。“一个‘世界历史个人’不会那样有节制地去愿望这样那样事情,他会有许多顾虑。他毫无顾虑地专心致力于‘一个目的’。”<sup>[6]30</sup> 在黑格尔看来,杰出人物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推动者。鲍威尔认为,哲学家的“批判”活动就是在变化运动中的绝对精神,世界历史不是“精神空虚的群众”的历史,而是绝对精神的发展过程。对此,马克思讽刺地写道:“历史上的种种对立从它那里产生,消灭这些对立的行动也从它那里产生。”<sup>[3]262</sup> 不论是黑格尔还是青年黑格尔派,他们都将历史的发源地看作是在“天上的云雾”中,而不是在“尘世粗糙的物质生产”<sup>[5]191</sup> 中。针对以往旧哲学对历史发源地问题的唯心解释,马克思批判继承了他们关于“劳动”和“感性活动”的观念并提出了“物质生产”这一范畴。他指出历史的发源地在“粗糙的物质生产”中,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运动中,物质生产是人的存在和社会生活发展的前提,如果我们在社会历史领域抛弃现实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

在第六章中,马克思首先说明了法国唯物主义起源于笛卡尔的物理学和英国的唯物主义,其次又通过对法国唯物主义批判的历史的系统梳理,说明在批判与实际发生的历史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针对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对于法国唯物主义的曲解,马克思援引了费尔巴哈关于物质与精神的论述对“思辨的创世说”进行了批驳:“鲍威尔先生在一切实领域中贯彻自己同实体的对立,贯彻他的自我意识的哲学或精神的哲学。”<sup>[7]345</sup> 在马克思看来,是历史的、现实的人处于社会历史之中并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历史本身并不具有能够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能力。在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充分考察之后,马克思指出人的知识是

在感性世界的实践中获得的,那么就必须要使人具备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即使人成为人;另一方面,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么对个人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就应该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此时,对于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使马克思摆脱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思辨传统,开始转向对现实的个人和人的感性活动代替抽象的人,从而发现了劳动在形成人类历史中的决定作用。对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反复阐释和强调,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向历史唯物主义推进了一步。

#### 4 论证了人的社会性问题

在人的社会性问题上,1844年的马克思在思想上仍受费尔巴哈的影响,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费尔巴哈对人的社会性问题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整个实证的批判,从而德国人对国民经济学的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sup>[210]</sup>。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经济学研究出发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国民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但他跟费尔巴哈一样在对于人的本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的问题上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将人的社会性与劳动紧紧结合在一起,认为人的本质在作为谋生的异化劳动中丧失,在通过共产主义运动实现的“人类社会”中得到复归。在此基础上,他认为真正的社会是以人的本质为联系的中介,而以商品、货币为联系的社会则是异化的社会。

在黑格尔哲学中,人是“思辨人”,黑格尔反对近代主体哲学的“抽象个人”概念,认为个人即是相互独立的,又是依赖于他人的。黑格尔虽然看到了劳动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的作用,但他承认的劳动是建立在以“自我意识”为本质的人的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因而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成了自我意识与另一个自我意识的关系。在对于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上,黑格尔提出人真正的自由是个体自由和伦理自由的结合,当个人的主观的意志同由绝对精神外化形成的共同存在的意志相统一时人便是自由的。青年黑格尔派则在这个问题上比黑格尔后退一步,鲍威尔、施蒂纳等人脱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将世界历史归结为观念上的历史,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劳动而是批判活动。在青年黑格尔派眼中,人是脱离了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人,马克思对其进行了批判——“施蒂纳不是成为实际生活中的人,而是成为无思想的、破产的哲学家”<sup>[8]262</sup>。

费尔巴哈则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颠倒过来,将个人归结为作为类的人,并将类进一步人格化为共同体。早期的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人的类本质思想影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仍大量使用“类存在物”等表述,但随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成熟,他对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开始了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个人”的思想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根本在于马克思开始探讨在“劳动”“社会”“社会关系”之下的人的概念。他对人的社会性问题的论述更多地基于现实的物质生产,他指出:“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那他就只能在社会中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不应当根据单个个人的力量,而应当根据社会的力量来衡量人的天性的力量。”<sup>[13]34</sup>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一方面,马克思吸收了费尔巴哈将“人”看作“社会的人”的思想,对黑格尔的“思辨人”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同时,他进一步形成了区分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的思想萌芽,发现处于同一社会关系与生存条件的人应当在他所处的社会中发挥天性并以社会的力量作为衡量标准。

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现实的人”思想的彻底分离完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其中他明确了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统一的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就在于其社会性,并且人的社会交往取决于他们自己的生产力,由生产力所制约:“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sup>[13]525</sup>自此,马克思对人和人的社会性问题的理解便由抽象的转变具体的、历史的。

#### 5 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理解仍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色彩,还未达到唯物史观,而是用异化的观点来论述其社会革命理论。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实现,的看法实际上是在历史观上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延续,但他关于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使人的本质得到彻底解放,使人得到全面发展等思想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及之后的著述中继续发挥了这些观点。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批驳了青年黑格尔派无视无产阶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揭露了在青年黑格尔派那里工人的劳动“始终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某种单一的工作”<sup>[13]260</sup>。在涉及在资本主义私有



制社会中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的问题上,青年黑格尔派认为无产阶级要想摆脱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屈辱地位就只能靠“纯粹的思维”,即无产阶级在头脑中自己解放自己,只要消灭了思想上的剥削观念,那么现实中的剥削也就不复存在了。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不能通过观念上的运动获得现实的解放,无产阶级仅仅在思想中得到解放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应在现实的运动中获得现实的解放。马克思接续了他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的思想,并进一步分析了人具有在历史中改变现状的能力——“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绝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sup>[7]274</sup>。人民群众想要消灭私有制,维护自身的利益,在生活中真正成为“人”,就只有自己解放自己。他强调,“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sup>[5]22</sup>,正在为消灭私有制进行斗争,推动历史发展前进的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青年黑格尔派所说的批判的批判。

借此,马克思首先明确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中,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是一个整体中彼此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两个对立面——“私有财产作为私有财产,作为财富,不得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不得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sup>[3]260</sup>。在明确无产阶级和私有财产既对立又统一的复杂关系后,对于他们二者在对立中所占用的特殊地位的探讨就尤为重要。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要想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须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即私有制和私有财产,并且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才会实现。在《神圣家族》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问题的论述重心已由对工人非人的生产生活条件的控诉,转变为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无产阶级经济地位出发探究工人与资本之间的矛盾。这一思想萌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更加深入的探讨。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并不会自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当某种生产关系还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且还未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它是不会被消灭的。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需要通过革命推翻统治阶级统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而实现社会发展。对此,恩格斯评论道,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不是建立在道德上,“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的、我们眼见一天甚于一天的崩溃上”<sup>[9]209</sup>。

## 6 指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市民社会是一个与国家相对应的概念,在马克思各个理论探索时期其含义不尽相同。早期马克思所探讨的市民社会主要指资产阶级社会,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是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直接来源。黑格尔将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看作社会伦理理念发展的三个阶段,并认为国家处于最高阶段,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通过对比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与现实的普鲁士国家制度,发现市民社会是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而不是源于自我意识或是所谓绝对精神,认为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应从现实生活关系出发,在政治经济学中寻找答案。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理论,对“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思想进行了初步论述,确立了市民社会的基础地位与国家为市民社会服务的立场,并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进一步通过论述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和物质生产劳动,为其市民社会理论走向成熟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对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延续了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对国家和社会做了进一步研究。鲍威尔在评论法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时强调,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的失败根源于政治上的失败而忽略了其社会原因。马克思认为,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的失败是由于他们将国家作为一切政治活动的目的,轻视了市民社会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必须以人权的形式承认和批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同时又力图在事后通过单个的个人来取缔这个社会的各种生命表现,同时还力图以古典古代的形式来造就这个社会的政治首脑,这是多么巨大的迷误!”<sup>[3]24</sup> 马克思在现代国家基础的问题上批驳了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地将“特权”和“特权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看法,提出“特权的对象”并不会因为“特权”的废除而消失,相反,现代国家的基础正是废除了“特权”的市民社会。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历史变迁的梳理,多次强调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sup>[3]312</sup>;

来。他们之间的现实的纽带是市民生活,而不是政治生活。……在今天,只有政治上的迷信还会妄想,市民生活必须由国家来维系,其实恰恰相反,国家是由市民生活来维系的”<sup>[13]322</sup>。由此可见,马克思深入到市民社会的内部结构中验证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科学性,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唯物史观重要原理又靠近了一步。

同时,马克思借由批判鲍威尔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抽象地将政治的本质和人的本质混为一谈的观点,指出要想解释人的现实生活不能从宗教出发,而应从宗教的实际基础即市民社会出发,在政治国家存在的前提下宗教和国家相分离只是完成了政治解放,政治解放并不能完成人的解放的最终任务。“现实的世俗的犹太精神,因而也连同宗教的犹太精神,是由现今的市民生活所不断地产生出来的,并且是在货币制度中最终形成的。”<sup>[13]307</sup>当马克思进一步研究如何实现从政治解放过渡到人的解放的问题时,他清醒地认识到实现人的全面解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现实的、历史的过程,而不是在思想观念领域就能完成的活动。这一初步构想为马克思有关“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思想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论述并在经济层面上做出了概念界定:“在过去一切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sup>[10]41</sup>也就是说,一方面,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性质,有什么样的物质生产关系就有什么性质的国家;另一方面,市民社会决定着国家的发展。市民社会是物质生产关系总和的表现,是国家以及其他上层建筑的现实基础。

## 7 《神圣家族》对唯物史观发展的历史意义

唯物史观的产生与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以及费尔巴哈唯心主义历史观批判的结果,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不断论证中自我批评的结果,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经济结构深入剖析的结果。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中,《神圣家族》是一部承先启后的关键性中介著作,起着直接的理论铺垫和准备作用。但基于其议题零碎、含沙射影的文本,许多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虽然有所阐发,但没有得到彻底、系统的呈现。这一任务在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以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中完整建构和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主要观点,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得以真正诞生。

### 7.1 批判了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关涉马克思思想进程。黑格尔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框架有很大的影响,而马克思早期也曾是黑格尔哲学的追随者,因此转向对于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是马克思思想转变与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关键环节。马克思通过对劳动问题的研究,以辩证法为突破口对黑格尔哲学转向批判,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开始,并在《神圣家族》中得以深化。

而《神圣家族》之所以被看作是马克思恩格斯承前启后的关键性著作,其关键就在于在这部著作中他们将对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范畴从属于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范畴,并以战斗的唯物主义者的姿态开启了对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唯心史观的彻底批判,由此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在“感性活动”的立场之上,马克思恩格斯借由对思辨唯心主义秘密的揭露,对群众史观、物质生产、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等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研究与认识,为此后唯物史观的系统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

### 7.2 开始了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超越

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与费尔巴哈思想具有密切关系,是在完成对费尔巴哈思想的超越之后才建立起唯物史观的。在《神圣家族》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了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超越,这也是《神圣家族》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环节上具有不可替代、承上启下地位与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哲学有着高度的评价。在谈到对于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时,马克思提出:“只有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sup>[15]77</sup>但是,马克思同样强调,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完成于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因此在对鲍威尔和黑格尔的批判之外,马克思已经逐步认识到其思想与费尔巴哈理论的界限。在随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才与费尔巴哈彻底决裂,在完成了对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超越的基础之上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唯物史观。

### 7.3 初步确立了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原则

《神圣家族》深化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想,是马克思思想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时期的重要著作。其中很多思想原理,如历史的发源地、生产方式、历史活动的群众事业、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等,都接近或包含了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唯物史观解释现实的起点是“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这就说明了历史的发源地问题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已经认识到“批判的批判”所做的仅是“用现存事物的范畴来制定公式”<sup>[5]2</sup>,因此,对于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也就是对其模糊历史问题的黑格尔哲学内核的批判。通过对物质生产的分析和西欧哲学中唯物主义发展历史的梳理,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在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那里人与历史关系的颠倒,将唯物主义原则从自然领域扩展到社会历史领域,实现了唯物主义在历史上的初步应用,为唯物史观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 8 结束语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代表着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闪光阶段,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揭示思辨结构的秘密,批判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英雄史观为开端,马克思恩格斯初步确立并论证了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的发源地、人的社会性问题,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等一系列唯物史观基本原则,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开始了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超越,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系统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6]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1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责任编辑:范可旭)

## On Budd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Holy Family*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MA Jing-yue

(School of Marxism,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Manuscript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in 1844* to *The Holy Family*, and then to *The German Ideology*,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experienced a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gestation to birth and from germination to 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Holy Family* is a very important work and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Holy Family*, Marx and Engels repeatedly and thoroughly criticized Hegel's speculative philosophy by criticizing Bauer's philosophy of idealism, and combined the criticism of German philosophical idealism with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important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orming preliminary statements of some critical viewpoint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hich laid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 words:** Marx; *The Holy Family*; historical materialism